

■新作聚焦

# 王安忆长篇小说《儿女风云录》： 海上繁华梦续 儿女风云初记

□吴言

《儿女风云录》开篇第一句：“上海地方，向来有一类人，叫做老法师，他是其中一个。”沉浸在小说的氛围中，一帧帧唯美的电影镜头在王安忆笔下复现，传奇就此拉开序幕。上海这座城市，配得上这样的声色和文字；这些上海儿女，也没有辜负这座城市，尽情塑造和展现着自己的故城。海上繁华梦，就这样绵延不绝，循环往复着。

这一次，王安忆又给读者带来惊喜。就像是印象派大师的画作，是朦胧的、混沌的、氤氲的，不是线条描出来的，而是色块涂就的。王安忆一直是写实派，加之细腻的海派笔触，以前的作品常给人以工笔画的感觉，这一次则走向了印象派。这种变化更多是题材赋形，这次的题材不再是市井凡人，而是坊间传奇，是聚光灯下的舞者。

王安忆前几年的作品，如《考工记》《红豆生南国》，弥漫着一种节制的气息。《考工记》中的男主角守一座老宅，终身不涉情爱，修士一样。《红豆生南国》的男主角，还并未老，就已弃绝了相思。《儿女风云录》的男主角名为“瑟”，有如天人下凡，开始渡他的情劫，所倚舟筏，是他精美的皮囊，是外国人的身材长相。他的祖籍宁波是最早的通商口岸，有机会染杂外族基因。舞蹈成了他的船桨，划着舟筏在世事中沉浮。瑟年轻时是舞台上的王子，年老时是舞台上的“老法师”，自幼跟随白俄老师学舞蹈。北京舞蹈学校半途而废的学舞经历，为他后来辞去外埠工作打下伏笔，留在上海成了一名无业人员。没有稳定职业，一生在主流社会之外，注定起伏不定。不过凭着舞蹈这一技之长，年轻时能在乱世中谋生，在中年时斩获高光时刻，将老之时还能在舞厅受到追捧。从小在母亲沙龙的女眷中浸淫，走的又是舞蹈一路，瑟养成阴柔的、善解人意的性格，但舞厅是准风月场，能带给他各色奇遇，也能让他沉沦到触底底线。

为什么这样一个生在钟鸣鼎食之家的人，会走上这样的命运？王安忆细密的写实之下，有着严密的逻辑推理，一环扣一环，一步步推到了这样的结局。人物的命运紧贴着时局，给人以宏大深沉的历史感。

伴随着瑟命运起伏的，是他的生长地，一座上海洋房的变迁。小说第一章也说了，主人公“和这间房子一样，属于历史的残余。”房子像是命运的隐喻，能见证历史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之初，房子被分割出去，成家后在妻子的力促下一间间收回，终于又恢复成一座完整的私人宅邸。他的个人抵达圆满以后开始走下坡路，离婚后房屋又遭分割，先是前妻卖了三层，后来父母及他为出国典卖房屋，仅留一间，让他在告老还乡时不至于流落街头。

小说里的“阿”字辈是市井里的贫民。他们家主要靠的就是阿郭，以前沙龙时期舞伴家的司机，出于对这家母亲和儿子的情愫，一直不离不弃。另一个保护瑟的是阿陆头，这是另外一条隐约的主线。如果没有阿陆头，仅是瑟这一男子，称不上是“儿女风云录”，必须有阿陆头补足。他们是邻居，一个住弄口一个住弄底，一个住汽车间一个住洋房，用阶级或阶层划分，原本就是两种人。两人差着辈分，是两代人，际遇全然不同。瑟是新社会贵族遗老的遭遇，阿陆头走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两人初次交道，是他为她量身量体，一个半舞蹈专业人发现了一颗好苗子。两人间暗生暧昧，瑟在往后岁月里总是能想起她。阿陆头在少体校练过几年，后进入到宣传队，打下了一点舞蹈的底子。这点底子和这点暧昧，后来又让他们走到一起。阿陆头经过革命后回沪，瑟离异后又无业，两人成为名震沪上的拉丁舞搭档。如果沿着这条线走下去，也许会让故事落入俗套。但王安忆又安排他们各生变故，十几年不见，再见时，阿陆头成了广场舞的“教头”，走的还是大众路线，成了交谊舞



老法师，瑟则为阿陆头做编舞指导。作家窥得广场舞的前世，为这一蓬勃的群众运动正名。小说开篇，老法师在舞曲的高潮中隐身，回栖身的旧宅用过西式晚餐，换身装束，穿过夜色，出现在广场舞曲终人散之地，和阿陆头在无声中舞一曲拉丁，两人间尽显默契。这两人从来没有越界，他们各自守护着心底那一小块领地，不被世道染杂，弃去情色，就有了情义。小说结尾处，是瑟到阿陆头这里休息，最后瑟入狱，还是阿陆头担负起了探视的责任。

正是瑟和阿陆头开始搭档拉丁舞之际，作者王安忆用这段话切题：“上海的里巷，最容得下离经叛道。弄堂其实顶不规矩了，那些窃窃私语的女人，看野眼的男人，大人骂小孩，小孩彼此相骂，哪里有体面可言？事实上，阿陆头和柯柯，都是过来人。她们所以那么坦然，就是得之弄堂的教化。一代一代的儿女们，传承下来，让这坊间里巷越来越寡廉鲜耻，变成大染缸。”只有他们这样经历了大时代的动荡，个人命运跌宕起伏，才称得上是风云人物。这风云不是潮头的宏大叙事，是个体的风云际会，所以就是儿女风云录。

王安忆用虚实结合的方式写作，小说中瑟在外埠煤矿遇到大麦，都是回忆中的印象记，用印象派的色块，涂抹出朦胧的一片，火车站、老宅子都浸在雾霭之中。“埃塞俄比亚”在香港的一夜，也是和梦掺杂在一起，不辨真假。到故事最后，瑟和众多女舞伴交往，也没有写出具象，还是各种色块堆叠的细节。拉丁舞是激情四射的，王安忆的文字也随之变化。以往的文字总是平静如水或暗流涌动，这一次写到拉丁舞，声光色交织飞舞，文字就要飞扬起来。用文字追上了声光色，就像绘画史上从写实走向了印象派。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多是印象派的，如“埃塞俄比亚”“小二黑”等，以外号立人，契合各自身份。主人公瑟的名字也是虚取，来自英文sir，先生之意。这位瑟各阶段名字不一，小时候因为长得像洋娃娃，名字就叫热尼亚，成年后活在传说中，身负各种外号，事业开启后坊间称其为瑟，年老后称其为

王安忆细密的写实之下，有着严密的逻辑推理，环环相扣，循序渐进。故事人物的命运紧贴着时局，给人以宏大深沉的历史感。他们经历了大时代的动荡，个人命运跌宕起伏。所谓儿女风云，不仅是潮头的宏大叙事，更是个体的风云际会。

老法师。想必瑟在户籍簿上也是有一个正经名字的，但倘若用这名字就太写实了，淡化了人物的神采。相比之下，阿郭和阿陆头则是用里弄的真名，很接地气，也和他们身份相符。

学者陈思和曾评价王安忆总是“词不达意”。细想一下觉得恰当，这并不是贬义，说的是王安忆的语言风格不追求十分精准，言简意赅，只是抓住色、声、香、味、触、法，不丢掉一点点细节，是混沌的，繁复的，有毛边的，最后描摹出的画面却令人印象深刻，揭开事物面纱，露出本质。就像印象派画作，可能是契合了大脑的图像记忆机制，我们像摄影机一样，将这些文字在脑中转换为画面，印在脑海中。

这印象不是局部的，是画卷式的。王安忆的小说确实担得起“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样的定义。她已获得了一种宏阔的视野，将真实历史和小说中的人物粘得天衣无缝。她笔下的人物都不像是虚构的，而像是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有根有样。这样宏阔的视野，让人更能增加对无常世事的整体把握。小说中瑟的命运转折，是在外埠被阿郭找回之时，正是1976年。现实是自那以后国家拨乱反正步入正轨，他在乱世时很有市场的舞蹈教习工作就得关停了。归根到底，王安忆还是用理性认知和把握这个世界，在小说末尾，她这样写道：“他就是个浮泛的人，不曾有深刻的理性的经验，险些开蒙，方要下脚，又收住，回到水平线上。”对瑟的评价也体现出王安忆用感性题材去诠释理性的尝试。

作家挖掘了一口深井，打通了一条地脉，清冽的泉水在源源不断地涌出地表。2024年，对王安忆来说是特殊的一年，她在复旦教学20年并荣休，写《儿女风云录》更像是一个纪念。她以前说过，过了60岁就不再写长篇小说了，但实际上，《匿名》之后的这十年间，她还是不断有长篇问世，《考工记》《一把刀，千个字》《儿女风云录》，笔力丝毫不减，如此绵长的创作生命值得我们细读与研究。（作者系山西省作协签约评论家）

## 文学名刊 新作扫描

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新刊中，王树增、迟子建、徐小斌、梁鸿、鲍尔吉·原野等作家带来全新作品，观照时代和生活中的变化与平衡，擦亮记忆和情感的光泽，也呈现出都市之外的广袤天地。许多青年作家也在近两月的新刊中登台亮相，新一代作家的文学审美和文学气质，为文坛带来新鲜朝气。在收获的季节，新刊新作如同饱满的穗子，我们从中看到时代内外的肌理，倾听青年作家的新声。

### 观照时代经验中的变化与平衡

时代与人一直处在变化之中，风流激荡，孕育出数不尽的故事。本次关注的新刊中不少新作，都紧密关注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

王树增《天著春秋》（《当代》2024年第5期）回望历史上波澜壮阔的春秋时代，那时有群雄四起的野心和热血，也有缜密哲思与诗意的灿烂辉煌。一场场战役推动着历史的滚滚车轮，霸主轮番登场，思想繁盛如织，这宏阔的历史画卷中，闪耀着文明之光。季栋梁《登上人》（《人民文学》2024年第9期）关注乡村脱贫攻坚，书写六盘山地区上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深入描绘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心路历程。作家还关注到现代文明意识形态与乡村伦理道德体系的碰撞与磨合，传统观念既有遗失，也有不渝的坚守。王十月《不舍昼夜》（《十月·长篇小说》2024年第4期）讲述了王瑞午随改革浪潮奔涌的一生。王瑞午走出农村、南下打工、创业、做直播等人生经历，反映出50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他一生在城乡之间往复的动力，显示出不同时期对自由的理解与追求。

聚焦时代的脉脉，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往往看似平静，却暗藏着那些不为人知的漩涡。陈世旭《鹤之舞》（《中国作家》2024年第8期）描绘了一座院落中的文艺界众生相，鹤的纯洁与高贵寄托着人心深处的向往。滕肖澜《平衡》（《十月·长篇小说》2024年第4期）以当下上海为背景，作家深入人性与生活的幽深地带，笔调幽默但有锋芒地写出了主人公梦境和现实里的种种“无法平衡”。

一些颇具现实感的议题也在作家笔下得到探讨。蒋在《呼吸》（《北京文学》2024年第8期）聚焦亲密关系中的权力问题，从一位女性的视角切入，作家以不连贯的叙事时间呈现她的情感和遭遇，为阅读带来一种混沌和不稳定感。李燕燕深入调研、详尽探究近年多起校园霸凌案例，写下报告文学《校园之殇——关于校园霸凌的社会观察》（《北京文学》2024年第9期），呼吁全社会提高对校园暴力问题的关注和重视。袁凌《晒水》（《青年文学》2024年第8期）记述了三个不同地点关于“晒水”的故事，这是底层劳动者的生活智慧，也是打工生涯中一份难得的安慰。

### 擦亮记忆和情感的光泽

在文学中，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自身，往昔的瞬间被定格。随着目光的聚焦，情感的轮廓逐渐清晰，那些隐秘瞬间被重新照亮。

一些作品往往将空间作为记忆之场，借某些具体的物事唤起回忆。徐小斌《隐秘碎片》（《北京文学》2024年第9期）将一系列故事的碎片串珠成链，在意象和意象的缝隙中，闪现着智性的趣味和人性的幽微。鲁敏《寻琴》（《十月》2024年第5期）中，主人公想要回到已成废墟的桥头市场，寻找童年时的一筒玻璃弹子球，寻回珍贵的旧时光。艾玛《房间里的伏尔泰椅》（《当代》2024年第5期）则是虚构了一个梦境中的房间，房间里有一把“伏尔泰椅”。这个房间和这把椅子，使“我”重温起那些和亡妻共度的旧梦，也引起“我”许多关于文学和写作的思绪。

当下人们情感的可能性也在城市中衍生。《青年文学》今年第8期和第9期的“城市”栏目分别推出赵松《豪华游轮》和戴冰《林恪和杨黎明的三次会面》，作家通过书写城市中人与人间微妙的情感，反映了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揭示了人在城市中的连接与孤独。放眼都市之外，对自然的书写敞开了另一片别样天地。鲍尔吉·原野《飞上唐古拉山的蝴蝶》（《当代》2024年第5期），以白唇鹿、楚玛尔河、藏雀等自然景观和生灵视角，想象它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作家以自然之眼观自然，他笔下的世界万物有灵。沈书枝《雪后严寒》（《北京文学》2024年第8期）书写人与鸟的和谐相处，冬日中有着融融暖意。

写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心和情感，是文学的应有之义。文学作品如何书写个体军人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验，是部分作品思考的话题。西元《徒步走到终点》（《人民文学》2024年第8期）围绕某边防团一支巡逻小分队的一次行旅，深入当下军人的内心世界，呈现他们的精神求索。《中国作家》2024年第8期推出“军旅题材小说专栏”，刊载曾皓、言九鼎和贾秀琰三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他们的写作切近当下军旅生活和时代精神，塑造出鲜活的新时代军人形象。

而在文学中回望切身的经验和记忆，能够重新激活深层的情感。陈世旭的短篇小说《表叔》（《北京文学》2024年第8期）塑造了悬壶济世的表叔这一人物，赞美了表叔象征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在《口述史：表叔访谈录》（《十月》2024年第5期）中，年近百岁的女诗人友娃重谈自己的情感生活，点滴细节映照中国当代历史中几次重要转折。陈昌平的短篇小说《蝴蝶发夹》（《中国作家》2024年第9期）中，“我”的老同学兜兜转转喜结连理，“我”少年时的日记本也回到手中，青春记忆在人到中年时有了温暖的回响。

### 倾听彼处之声

一些故事发生在远方，行走是写作永恒的资源。迟子建《爱荷华日记》（《当代》2024年第5期）是作家于2005年访问爱荷华期间的日记节选。作家以敏锐的好奇心和观察力，记取从身边人和身边事中获得的感知与思考，与友人的情谊亦是静水流深。梁鸿《无尽的彼此》（《当代》2024年第5期）中回忆几次旅途际遇，不同的出行方式、不同的地域文化，带来新奇的体验。与远方和他人的相遇，激起心中涟漪。程霖《在散》（《北京文学》2024年第8期）中，深情忆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家人与哈尔滨文艺界的交游经历，往事在回忆中枝繁叶茂。

面对近年来的热点话题，作家们在文学作品里以人工智能为媒介，思考科技对社会、人性、情感可能造成的影响与改变。王晋康的长篇小说《行歌三叠》（《中国作家》2024年第8期）以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情为主线，思考这个由科幻和两难组成的世界会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发生何种变化和后果。张翎的中篇小说《种植记忆》（《十月》2024年第5期）里，小女孩千色因车祸失忆，父亲借助芯片技术和人工智能帮助她寻回记忆。随着记忆恢复，梦境和现实中的谜团逐一揭晓，爱的内核水落石出。

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新刊中，青年作家携新作登场，带来新鲜之风。《人民文学》2024年第8期“写作课”栏目和第9期“青年新创作”共推出了陈王言诺、吴越、孙孟媛、刘星元、李达伟等九位作家的短篇小说或散文；《当代》2024年第5期“发现·新人四重奏”栏目推出杜娟、程惠子、先志、胡诗杨四位作家的短篇小说；《十月》2024年第5期“小说新干线”栏目推出戚颖两篇科幻小说……不论是初涉创作的文学新人，还是已有一定创作经验的青年作家，他们的写作中，可以看出青年一代写作者趣味多元，叙事形式多样，既书写切身的经验和感受，敢于直面社会现实问题，也看到他者和远方。观察青年作家新作，众声喧哗、杂花生树的丰富面貌引人入胜，期待青年作家在个人经验与时代经验的对话中激活新的美学，展现青春力量。（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 《十月》《人民文学》《当代》《北京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描摹时代内外的肌理

□万婧

## ■新作快评

晓苏短篇小说《我的堂弟李小样》，《湖南文学》2024年第8期

# 有意思的小说

□刘川鄂

晓苏的乡土小说大都以故乡鄂西北乡村为背景，虚拟化的油菜坡是他为当代短篇小说独创的“logo”。他善用粗线条状物叙事，提炼世俗化的日常生活，描摹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探讨时代变迁中人性的常态和变异。新作《我的堂弟李小样》仍以油菜坡作为小说创作灵感，一如既往地延续着民间视角、底层关怀和个性语言，也呈现出一些令人欣喜的新特点、新探索。

男主角李小样由一个吃苦耐劳、重感情的乡村少年，变成了一个偷奸耍滑、吃喝嫖赌样样来的小混混。关于李小样的变化缘由，作品匆匆掠过，仍不免令人思索：在稳定的乡土环境中，主人公尚能保持淳朴、实在，可往往越是这样的老实人，越容易被变动的环境、复杂的人性影响。小说重心在李小样变成“奥歪歪”之后的行迹。他每天酒足饭饱之后，作为余兴，还要来一瓶奥歪歪饮料爽口，成了他个人的一种特殊的生活习惯，因此得了这个绰号。绰号是贯穿作品的核心线索，有着多重意蕴。奥歪歪饮料作为实实在在的“物”，铭刻了故事发生的年代、地点。亲友和村民们对李小样称呼的变化，反映了好取名、取绰号藏否人物的常态风俗。平顶山挖煤只是激发李小样本性的契机，他的堕落映射出伦理失序、精神滑坡等问题，传递出晓

苏对于人性、伦理的探索。

作品构思立意的着力点，在于通过这个有几分奇异性色彩的人物揭示人性中“爽”与“歪”的双重内涵。“爽”是表面，“歪”是本质。李小样自己“爽”了，但不顾他人死活的快活却类似一种“歪门邪道”；“爽”得了一时，却要在牢房中一直“歪”下去。这个模样周正、巧言令色、身无长技、好吃懒做的村夫，终于走到了借钱无门、四处躲债的极度窘境中，他铤而走险，做了蒙面小偷，最后被公安抓捕，这是他必然的人生归宿。不走正道的人生，永远没有好结果。由此可见，作品深具讽刺意味，且有积极的、普泛性的警示意义。晓苏力图颠覆乡村社会程式化、稳定式的财富和婚恋书写模式，回归生命本真，展现底层的开放性、多元性，以及无理战胜合理的荒诞现实，荒诞又真实地展现出农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借用文中的话来说，“世上的事，真是无奇不有”，幽默、戏谑的笔调透露出人性拷问、人道关怀。

小说还聚焦金钱、物质与道德、面子的复杂纠葛。“奥歪歪”去龚喜顺店铺赊钱，言而无信，工钱明明按时拿到了手，却倾尽在吃喝嫖赌上，死皮赖脸找成佛借两万块钱，十几年一分钱也没还。而在找“我”借

钱时，“奥歪歪”可谓是碰上了“天时地利人和”，那时“奥歪歪”还未离婚，“我”也并未听说他借钱吃喝嫖赌的事情，而“我”当时手头现金比较活泛，加之他掐准了“我”心肠软、好面子，可怜牌、悲情牌一出，这钱便像滚雪球一样越借越多，“只借不还，脸比石磨子还厚”。从另一个角度看，“我”的心软、心善是乡村文化中的正面因子，只不过，这种善良、心软有时也需带点“锋芒”。文章在“我”与“奥歪歪”的对比中，真实描绘出乡土社会中糟粕与精华共存的生存境况。“奥歪歪”是当下某类巧滑、不走正道的乡村人物生动形象的概括。作者通过对这种特殊人物的塑造，显示出探索人性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的努力，是对中国当代农村人物形象画廊的出色贡献。

晓苏主张写“有意思”的小说，意即“从情调和趣味出发的，它不求宏大，也不求深刻，或者说，它不怎么重视意义的建构，只求渲染一种情调，传达一种趣味”。他关注被正统历史和主流社会所有意或无意忽略与遮蔽的存在，直面人之本性与人性的弱点，将陌生感落于接地气、自由活泼的生活经验与民间风味中，“彰显出感性生命的无限丰富性与多种可能性”。

（作者系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